

การศึกษาอิทธิพลของจั่วจ้วนในการ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ตำนานในงานเขียน

สมัยถัง

The Influence of Legendary Creations in Tang Dynasty because of *ZuoZuan*

《左传》对唐传奇创作之影响

ทาง ยีววน¹

บทคัดย่อ

เอกสารด้านอัตชีวประวัติและนวนิยายมี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กันอย่างใกล้ชิดและซับซ้อน ซึ่งสำหรับงานเขียนจั่วจ้วนแล้วล้วนมีอิทธิพลต่องานเขียนทั้งสองประเภทไม่มากนักน้อย ด้วยเหตุนี้เอง บทความฉบับนี้จึงอยากจะเสนอมุมม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บรรยาย 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ในเนื้อหาางานเขียน และแนวคิดทางด้านศีลธรรมจรรยา ที่มีต่องานเขียน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เกี่ยวกับตำนานในสมัยถัง

คำสำคัญ: จั่วจ้วน; ตำนานในสมัยถัง; อิทธิพล; มุมม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บรรยาย; แนวคิดด้านศีลธรรมจรรยา

¹ ทาง ยีววน สาขาวรรณคดีโบราณ คณะภาษาจีน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นานจิง สาธารณ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TANG YEE WOON ,Depart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 Jing University P.R. China

陈依雯，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Abstract

The nexus is intimate and delicate between historical biographies and fictions. However, the writing mode of *ZuoZhuan*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subsequent creations of historical biographies and fictions. On this account, it is going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legendary creations in Tang Dynasty because of *ZuoZhuan* through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th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the authenticity of works and the moral concept in this paper tentatively.

Key words: *ZuoZhuan*; legends of Tang Dynasty; influenc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authenticity; moral concept

摘要

史传与小说二者间的关系既亲密又微妙。而《左传》的写作方式对后世的史传文学与小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叙事视角、作品的真实性及道德观念这三方面论述《左传》对唐传奇创作之影响。

关键词：《左传》；唐传奇；影响；叙事视角；真实性；道德观念

一、前言

历史与小说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史传文学中包含的一些传奇色彩足以构成小说的写作成分；小说创作中又蕴含了史传的“实录”情结，二者的关系即亲密又微妙。追溯小说的渊源，可从远古神话开始，但以文体而论，史传文学才是孕育小说的母体，直到唐代，唐传奇的出现，才是鲁迅所

称的“始有意为小说”¹。

《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以人物为描写为中心，高超的写作技巧，奠定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地位，无疑是古代小说创作的“楷模”。“但作品的叙事结构、塑造人物形象的某些方法、技巧却是发端于《左传》的。司马迁《史记》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的文学成就，它的具有明显小说因素的‘列传’，看来虽然好像是小说产生的‘因’，但同时它又是《左传》影响下的‘果’。”²故此，探索古代小说的文体创作、思想概念等根源，可以以《左传》作为基础，更可从中了解史传文学与小说间的微妙关系。

《左传》全书六十卷，十八万多字，是第一部记叙完整的编年史。作者精湛的写作方式使《左传》兼备了历史与文学二者经、纬交融的文学特色，对后世的史传文学及小说创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特色，同时也是小说创作的基本条件，可以说，《左传》问世后，就已为后世小说树立了写作的典范。以文体的演进而言，唐人“有意识”的小说创作，除了承袭汉魏六朝志怪、志人等小说发展的轨迹外，也受惠于《左传》、《史记》等史传文学。唐代作家的“写作意识”里，除了有好记奇闻逸事的特征，更有对历史“实录”的写作精神，甚至在观念上，包含了写小说也等于写史、是为人物作传旌美之类的想法，受史传和史官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因而出现了许多类似史家笔法的小说作品。

基于此因，本文以《左传》和唐传奇为对象，从叙事视角、作品的真实性及道德观念这三方面论述《左传》对唐传奇创作之影响。

¹ 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第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² 孙绿怡著《〈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第75-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二、《左传》对唐传奇叙事视角之影响

《左传》是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¹。作者以简练的文字造就了一部叙事完整的史书，是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史传著作。刘熙载论云：“刘知几史通谓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余谓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²然而，《左传》的写作魅力还不仅仅限于史传的范畴，它对后世小说的创作，无论在故事架构、记言记事、人物刻画等方面的影响都很深刻。

在“秉笔直书”的“实录”原则上，《左传》采用了不同的叙事视角来写作。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里《史传中的小说文体因素》一文中指出史传写作的两种叙事视角，这两种视角可以作为窥探《左传》叙事视角的方法。

一、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客观叙述，又可分为“全知视角”及“客观叙述”。“全知视角”是让作者充当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角色，对故事人物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了若指掌。如《左传》宣公二年：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麇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³

“客观叙述”则为史传文学的传统写法。在记叙中，作者不直接表示自己的倾向，而是让事实说话。但作者并非没有立场和观点，公正、直书就是他们

¹ 童庆炳：“在《左传》之前的《春秋经》虽记事，但没有‘情节’；《诗经》中也有叙事的篇章，但那是在‘歌唱’故事，重点在抒情，是抒情文学的一种，不能算叙事文学。寓言则注重背后的理，很难称为叙事文学。真正具有虚叙事文学要素的是《左传》。”见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第43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² [清]刘熙载撰《艺概·文概》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³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二）第65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版。

的立场和观点。在史传写作中，这一点就体现在用字遣词的斟酌上，微言中藏大义，即所谓的春秋笔法。此笔法对后世小说的叙述方式有着极深远的影响¹。

唐传奇在写作上就对《左传》的叙事视角有所继承和发展。首先，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而言，全知视角的特点在于作者对人物言与行的掌握，大多通过记言表达人物的想法，作者仿佛能够透视所有角色的心理和思维。唐传奇中也有许多记言的描写，皆通过对白的设计，表达人物的思想言行，可谓为“全知视角”的体现。此外，作者对于所有物与象的认知往往超乎一般人，如王度《古镜记》：

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

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时，引镜出，自觉镜亦昏昧，无复光色。度以宝镜之作，合于阴阳光景之妙。不然，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叹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渐明。比及日复，镜亦精朗如故。²

作者先以疑惑的方式猜想宝镜混浊的原因，又以猜想的心理活动解释发生在宝镜上的种种现象，达到了“全知视角”的叙述目的与效果。再者，以“客观叙述”而论，唐传奇的作者在情节的发展中常以叙述者的立场客观“说”

¹ 石昌渝：“春秋笔法对后世小说的叙述方式有着极深远的影响，文言小说受史传的直接影响自不必说，白话小说脱胎于‘说话’，在它发展的途中很长阶段不能摆脱说唱文学体制的制约，直到作家独创的小说作品出现以后，小说的书面文学性质才更加确定，作者也就不再在情节进行中频频出来打岔，而退隐在情节背后，这时候的叙述就近于客观叙述。”见石昌渝著《中国小说源流论》第7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

²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3页、第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故事，通过一些情节的进展、人物的对话，揭露现实和揭示角色的善恶。如：蒋防的《霍小玉传》，霍小玉临死前对李益的一番怨言：“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¹作者借霍小玉之口，谴责李益的薄情，而最后李益的结局是“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²李益的负心，导致了其结局的悲剧，即在婚姻上发生种种问题。由此可见，作者充分地掌握了人物的个性、言行，进而通过记言及情节的发展将之呈现出来。

二、第三人称限知角度的客观叙述。这种叙事方法不普遍，却足以启迪后世小说的笔法。如《左传》成公十六年的“晋楚鄢陵之战”：

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待于王后。王曰：“驰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竈而
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
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祈也。”³

作者通过记言的方式，借楚王之口道出目中所见，“不直书甲之运为，而假乙眼中舌端出之”。故事中人物的视野取代作者无所不见的眼睛，这样叙述者也就彻底隐退了¹。

¹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 97 页。

²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 98 页。

³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二）第 884 页。

此类笔法也体现在唐传奇中，如：沈既济的《任氏传》。作者虽在文章结尾交待了写作的缘由：“大历中，沈既济居钟陵，尝与釜游，屡言其事，故最详悉。……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沈既济撰。”²但故事的发展中，作者全身隐退，以第三人称客观的叙述了小说的内容，以及人物的言、行来发展情节：

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郑子戏之曰：“美艳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

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为？”郑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辄以

相奉。某得步从，足矣。”相视大笑。

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自此东转，有门者，谁氏之宅？”主人曰：“此隤墉弃地，无第宅也。”郑子曰：“适过之，曷以云无？”与之固争。主人适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诱男子偶宿，尝三见矣，今子亦遇乎？”郑子赧而隐曰：“无。”质明，复视其所，见土垣车门如故。窥其中，皆蒹荒及废圃耳。³

又如《李娃传》，荥阳生遇见李娃后经历了一连串的事故，从被李娃欺骗、落魄、潦倒，到被李娃营救、资助、督促念书、赴考、最后名列第一。李娃

¹ 关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客观叙述”及“第三人称限知角度的客观叙述”详见石昌渝著《中国小说源流论》第69-77页。

²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57-58页。

³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52、53页。

自知身份卑微，理应功成身退，但最终二人还是共结连理，李娃还被封为“汧国夫人”。故事由始至终都以人物的言、行与互动来推演、发展，作者仅以“叙事者”的身份隐退幕后。

有别于《左传》的是，唐传奇的作者好以第一人称视角参与故事发展。作者往往是说故事的人，或是故事中的主角，如：张文成的《游仙窟》、沈亚之的《秦梦记》；有时则是配角，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这又是唐传奇在史传文学的影响下，推陈出新的创作方式。

三、《左传》对唐传奇作品真实性之影响

孙绿怡在《〈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中指出：“《左传》的叙事结构是由时间、环境、人物、事件等几个结构要素组成的，以年系月、以月系日、以日系事是这一形式的重要特征。中国古典小说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作品采用史传的叙事形式和结构，作家在组织素材、构造作品时，基本上是按照历史著作的格式来书写的。这已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一个十分奇特而普遍的现象。”¹以“实录”为“动机”的小说创作，在唐传奇中屡见不鲜。而以文体的演进而言，唐传奇除了得到史传文学如：《左传》、《史记》等的影响，也受惠于六朝志人志怪的熏陶。故此，唐传奇的许多故事内容中屡见真实；真实中又不免离奇，它们体现了历史真实与小说虚构互相交融的复杂特征。一些作者虽也存在着史学家的“使命感”，刻意将情节或细节记载得很详细（如时间、地点等），但基于是在写小说，因此，又同时存在着好记奇闻异事的心态。还需一提的是，唐传奇的作者多为文人、史官，

¹ 孙绿怡著《〈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第76页。

在创作小说时，对史传文学的书写风格亦有所秉承，虽撰“传奇”却仍保有“实录”、“作传旌表”的传统。

以体例而论，《左传》的编年体体例，对唐传奇在强调“真实性”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效应。唐传奇里的许多篇章，都以时间的记载作为序幕。如：《补江总白猿传》：“梁大同末……”、沈既济《枕中记》：“开元七年……”、陈玄祐《离魂记》：“天授三年……”、蒋防《霍小玉传》：“大历中……”、柳琔《上清传》：“贞元壬申春三月……”；牛僧儒《玄怪录·张佐》：“开元中……”等等¹。唐传奇的作者，一方面未完全脱离史传文学的写作方式，一方面又想增加小说的“真实性”，因此，出现了许多以“编年体”方式来“记载”故事的方法。此外，尽管一些作者“有意识”的撰写超乎寻常，涉及鬼怪的内容，但还是很清楚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如李公佐的《卢江冯媼传》：“冯媼者……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媼逐食于舒，途经牧犊墅。”²

除了“编年体”的影响外，唐传奇的作者颇费心思地将奇闻异事“真实化”的笔法有四种类型。

一、对时间、地点和人物身份的详细记载。如《补江总白猿传》：“梁大同末，遣平南将军藺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陈鸿《东城老父传》：“老父，姓贾明昌，长安宣阳里人。开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

¹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 18、45、59、92、209、245 页。

²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 117 页。

岁，九十八年矣。”；韦瓘《周秦行纪》：“余贞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将宿大安民舍。”¹

二、清楚说明故事的来历。见陈玄祐《离魂记》：“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凯，因备述其本末。凯则仲凯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²陈玄祐的《离魂记》写的是灵魂出窍的奇事，但作者却清楚交待且记录此事件的始末，宛如真实存在的事件一般，耐人寻味。又如白行简的《李娃传》：

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以生为代，故谳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李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³

作者不仅清楚地说明故事的来历，连为李娃作传的原由和目的都一一阐述。

三、亲自参与故事情节的发展。李公佐就以第一人称走进了故事里：

至元和八年春，余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登瓦官寺阁。有僧齐物者，重贤好学，与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妇名小娥者，每来寺中，示我十二字谜语，某不能辨。”……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询访其由。

¹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 18、134、182 页。

²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 60 页。

³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 126 页。

娥对曰：“某名小娥，顷乞食孀妇也。判官时为辨申兰申春二贼名字，岂不忆念乎？”余曰：“初不相记，今即悟也。”¹

李公佐写的是自己偶遇，他以第一人称参与故事的内容，又以第三人称叙述故事的发展。而替谢小娥破解谜语一节，是其推动情节转折的关键，最后他还表明：“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²另，沈亚之的《秦梦记》：“大和初，沈亚之将之郃，出长安城，客橐泉邸舍。春时，画梦入秦，主内使廖举亚之。”³作者也以第一人称走进故事，叙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四、借小说人物暗喻真人、以真人的事迹作为小说题材。如：《莺莺传》里的张生、莺莺究竟为何人？据陈寅恪等考证，《莺莺传》是作者的自叙说。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故事的主人公确有其人，是作者借故事中的角色暗喻自己；而在取材真人的事迹方面，蒋防的《霍小玉传》里，男主人公李益确有其人，其事迹见《新唐书·文艺下》：“少痴而忌克，防闲妻妾荷严，世谓妒为‘李益疾’。”⁴。《霍小玉传》里的李益与史书中的李益个性有相似之处：“卢氏既出，生或侍婢胜妾之属，蹙同枕席，便加妒忌。……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⁵针对这一点，汪辟疆校录云：“据此，则是本传所称，猜忌万端，夫妇之间无聊生者，或为当

¹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111、113页。

²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113页。

³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195页。

⁴ 李益事迹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文艺下》第5784-57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⁵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98页。

日流传之事实。小说多喜附会，复举薄幸之事以实之，……”¹；而《长恨歌传》将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写入小说，作者也说：“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传云尔。”²对此，程国赋认为：“唐五代小说作家具有强烈的‘补史之阙’的主观意识。他们重视史学，在作品中公开声称创作的主旨在于补正史之不足，写作小说时也不忘国史。”³总的来说，小说在真实事迹的基础上加以描述，并借小说人物暗喻真人，虽然是在“事实”上进行加工，却也为“事实”添加了不少文学色彩。

当然，史传的“实录”精神，在小说创作里，仅止于“真实性”的范畴。可是作者清楚地道出了故事的来历，甚至亲自参与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反将“传奇事迹”真实化。或许，唐传奇的作者在创作小说的同时，由于“史官观念”的驱使，未免作品沦为《汉书·艺文志》里说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⁴因而精心设置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或直言是自己的所见所闻，以作为小说内容“真实性”的“证据”。

但，唐传奇作者将“传奇事迹”真实化的这种写作风格，仍然可以从《左传》的一些记事中找到蛛丝马迹。尽管史传忠于“实录”，史官的责任是“秉笔直书”，但在《左传》里，却也还包含了颇具传奇色彩的情节内容。这些内容虽为《左传》增添了不少的文学性，但以正史的角度而言，这

¹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 99 页。

²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 141-142 页。

³ 程国赋著《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第 1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⁴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第 1745 页，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些文学色彩却为《左传》带来了“失之诬”、“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等的说法。无可否认的是，《左传》里一些涉及民间传说或传奇色彩的内容，确实也是当时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一种展现。而这些内容也与记载的历史事件紧密相连，有些甚至带有预言色彩，可见《左传》的作者不仅具备了史学家秉笔直书的理性思维，也兼备了小说家的丰富想象力。”这种想象既有历史家推求事件因果、解喻事理的形象，又有文学家出于自身感受的虚构想象。”¹如《左传》襄公十八年：

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公与戈击之，首队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献子许诺。²

献子和巫皋梦中所见竟然相同，而这场梦却又发生在战事之前，如同一场战争的预言，巧妙地将梦与现实结合，使文章变得生动起来，增加了历史的偶然与传奇。又如《左传》昭公八年：

石言于晋魏榆。晋侯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或冯焉。”

¹ 孙绿怡著《〈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第28页。

²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三）第1035-1036页。

不然，民听滥也。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

今宫室崇侈，民力雕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晋侯方筑 虢祁之宫，叔向曰：“……是宫也成，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¹

作者借石头会说话的奇事反映晋国百姓的愤怒，“石言，不亦宜乎？”道出了晋平公统治末年，晋国“民力雕尽，怨讟并作”的情况，借离奇反映真实。此外，《左传》里还有一些情节与龟卜、筮占相关，这大多都与军事、人生命运之类的事件等相接，这更可直接理解为是当时社会、文化、风俗的现实写照。

四、《左传》对唐传奇道德观念之影响

刘熙载评《左传》：“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左氏释经，有此五体。其事左氏叙事，亦处处皆本此意。”²而唐代的刘知几看待历史的态度也是：“史之为务，申以劝戒。”《左传》有明确道德理想，它有条不紊地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间春秋列国的历史事迹，表现出作者对历史公正、正确的评价和道德观念。如描写“秦晋崤

¹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四）第1300-1301页。

² [清]刘熙载撰《艺概·文概》第1页。

之战”，秦穆公素服哭师一节，通过秦穆公的一段对白，褒扬了秦穆公的行为，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¹

字里行间鲜明地透露出人物的性格及评价了人物的过失。作者除了生动地刻画出人物的优、缺点，更在叙述历史的同时评价了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此外，《左传》里，常常出现“君子曰”、“君子谓”及“孔子曰”，这些都是以“礼”来评价人物道德的标准。如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作者以“君子曰”道出：

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己。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己。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惩不义也。……²

由此可见，《左传》惩恶扬善的观念十分强烈。司马迁的《史记》有“太史公曰”，显然是对《左传》这一写作笔法的继承。而小说功能重“教化”，

¹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一）第 500-501 页。

²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四）第 1512 页。

与史传的宣扬的“劝戒”目的一致，《左传》显现出的道德观念，在唐传奇里也有所体现，其中以李公佐的《谢小娥传》最为淋漓尽致：

君子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傲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余备详全事，发明隐文，暗与冥会，符于人心。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¹

作者在文末很明确的表示为“春秋之义”的精神，而替谢小娥作传，赞扬了谢小娥的德行，借以“傲天下逆道乱常之心”。唐传奇宣扬正义的理念显然是受到史传文学书写模式的影响。李公佐在故事的发展中，也不吝笔墨，通过对白、情节，陆续将谢小娥的品德表现出来：

娥私叹曰：“李君精悟玄鉴，皆符梦言，此乃天启其心，志将就矣。”

里中豪族争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发披褐，访道于牛头山，师事大士尼将律师。娥志坚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²

《李娃传》也有相同的笔法：

¹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113页。

²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112页。

娃敛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齿于人伦。……今姥年六十余，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当与此子别卜所诣。所诣非遥，晨昏得以温情。某愿足矣。”¹

李娃的一段对白，将自己的过失、忏悔及补偿娓娓道来，阐述了李娃过错也赞扬了李娃的功劳。故事最终也详细地交代了李娃与荥阳生的美满结局。作者在《李娃传》文章的结尾对李娃的行为有着极高的道德评价：

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²

李娃是这样一位“节行瑰奇”的女子，作者表明为她作传的意义在于将她的节操流传于后世。唐传奇作者的褒扬人物的创作心态，与史传传统的“扬善劝恶”意义显然是相同的。自唐以后，明代的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有类似于唐传奇的褒扬人物的写法，清代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里作者的“异史氏曰”也都是这一笔法的延续。

无论史传或是小说，二者的都以德行、节操作为社会功用，这主要是因为二者都是在史官文化的道德观念下浑然而成的写作成果。

¹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124页。

²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第126页。

五、结语

史传文学与古代小说，二者间有着太多的牵连，可大致认为，小说就是史传文学嬗变而来的文体。比较史传与小说的共性，在扬善抑恶，劝戒教化中，“侠义”、“贞节”又是史学家和小说家最为推崇的。唐传奇中的《谢小娥传》和《纪闻》里的《吴保安》就分别因为贞节和忠义而受到史学家的关注，步入了正史的殿堂，吴保安入《新唐书·忠义上》¹；谢小娥入《新唐书·列女传》²。小说入正史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唐代的许多小说家同时也是史官（如沈既济、陈鸿等人），他们用写史的概念写小说，使小说看来仿佛“确有其事”；而小说有“补正史之阙”的功能，它又是“史之杂名”，因此，小说总是徘徊在历史与幻想的虚实之间。

“中国古代小说始终与‘史’保持着难舍难离的关系，前者总是极力向后者靠拢。”³而《左传》作为叙事文学的开篇，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意义更是非凡。学界大多认为，《左传》的叙事带有许多小说的笔法，或可以说，是《左传》的文学笔法，为后世的小说树立了写作的楷模。《左传》在真实中夹带了传奇的魅力；而唐传奇在虚实中体现出历史的真实，二者的光芒，在史传与小说间互相交汇。无论是史传还是小说，是文字记载的历史事实还是虚构的文学创作，都是古人真、善、美的写作精神。

¹ 吴保安事迹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忠义上》第5509页。

² 谢小娥事迹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列女传》第5827-5828页。

³ 郭丹《史传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第82页，《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第 3 版。
2.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3.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4. [清]刘熙载撰《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5. 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6. 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7. 孙绿怡著《〈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8. 石昌渝著《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9. 程国赋著《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0. 郭丹《史传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97 年第 4 期。
11. 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